

# 日本天皇世袭制延续至今的原因研究述评

张建立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内容提要】**在日本，曾一度流行的皇国史观宣称，日本自神武天皇以来，天皇治世一脉相承，即所谓“万世一系”，从无间断。毋庸赘言，这种日本天皇乃“万世一系”之说缺乏根据，但若称其“千世一系”倒还基本符合史实。总体来看，尽管日本的政局经常风云变幻，政权由摄政、关白、幕府将军到藩阀官僚几经易手，但直至今日，天皇作为日本唯一合法的君主地位始终没有改变。本文对天皇在日本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得以世袭延续的原因研究，进行了概述和分析。

**【关键词】** 天皇 千年一系 世袭 原因

在日本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其最高统治者的称谓，经历了早期称“王”，4世纪以后称“大王”，7世纪初称“天皇”的称谓变迁，明确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国家的方针，则是在8世纪初《大宝律令》、《养老律令》公布实施以后。与较早出现的“天皇”称谓相比，“天皇制”作为学术与政治概念出现得比较晚，初见于共产国际制定的1932年纲领中。尽管如此，中国学者一般认为，作为政治制度的“天皇制”的建立，应该自日本大化改新以后就形成了，虽然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内涵。从时间上来看，天皇制可以分为古代、近代、战后三个阶段；从内涵上来看，天皇制可以分为古代极权天皇制（673-866）、古代象征天皇制（867-1867）、近代君主立宪集权天皇制（1868-1945）、战后君主立宪象征天皇制（1946至今）四种。自7世纪以来，虽然日本社会经历了由贵族社会向封建社会、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重大转变，但任凭社会如何动荡和变化，日本从未有过类似中国封建王朝频频发生的“易姓革命”，作为政治制度的天皇制一直延续了下来。时至今日，在早已进入了发达国家行列

的日本，没有姓氏和身份证，也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日本天皇，仍然被作为日本国家的象征，被视为日本民族的精神支柱，成为所谓的日本“人种的纯粹性与文化的同质性的体现者”。解析日本天皇为何能够世袭至今的原因，对了解日本文化、日本的国民性，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对这个问题，已经有很多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进行了认真的研讨，也发表了很多相关研究论著。下面，笔者通过梳理诸位先贤之研究成果，略陈浅见。

## 一、古代天皇一系世袭的原因

古代日本天皇得以一系世袭的原因，概言之有如下两点：

（一）以土地为主体的经济基础是古代极权天皇一系世袭的重要保证

一般认为，天皇之所以能够一系世袭千余年，首先是因为天皇曾集权力与权威于一身之故，这一点在古代极权天皇一系世袭上表现尤为明显。

马克思1859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

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简言之，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思考日本天皇世袭的原因时，依旧不能忽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个基本原理。特别是在探讨古代极权天皇和近代天皇一系世袭的原因时，尤其要关注经济基础的影响。

大化改新时期，日本在经济上废除贵族私有的土地制度和部民制，将全部土地和部民收为国有，使之成为公地、公民，实行班田收授制，在租税方面实行租、庸、调、徭役制。班田收授制成为维持天皇大权和权威的经济基础。明治维新时，明治政府通过地税改革，使封建领主土地制转化为地主土地制，地税维系着近代天皇制官僚体系，近代地主土地所有制成为近代天皇专权和权威的经济基础。一些日本左派学者早期的研究论著，基本上是遵循着这个基本原理来研究天皇与天皇制问题的，而且，其研究成果对中国学界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但是，如果仅仅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这一理论，并不能对日本天皇世袭至今的过程中发生的许多史事完全解释清楚。例如，9世纪中叶以后，国有土地所有制瓦解，私有庄园制兴盛，断绝了维系天皇制官僚体系的财源，天皇和皇室的经济地位下降；与之相反，封建领主的经济实力则日渐上升。天皇制经济基础的动摇和瓦解，导致了中央权力的消弱和分散，统治实权或旁落外戚，或旁落武士阶层，或完全受幕府和将军的制约，天皇几乎就是一个政治傀儡。按照常理，失去经济基础的古代天皇制，也会随之土崩瓦解，然而，它却继续存在了下来。在幕府统治下，天皇的权力虽然已经十分微弱，但是，幕府将军的任命，国家的重大事宜，均需通过天皇发布诏书、敕令来实现。又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占领当局的监督下，实行了农地改革，废除了近代

地主制，作为近代天皇制经济基础的土地制度被彻底地废除了。天皇和皇室不但失去了固有的经济来源，而且现存的全部财产也被收为国有。按照《日本国宪法》规定：“皇室的一切费用，必须列入预算，经国会议决”。天皇和皇室成了名副其实从国库领取薪金的人。依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至此天皇制也理应寿终正寝了，然而，它并未因此而退出历史舞台，却作为日本国的象征、国民统一的象征而留存至今。

因此，恰如王金林指出的那样，千余年来“一系”的天皇与天皇制，虽然在不同历史阶段有其不同的特征，但彼此之间却有着内在的同一性和连续性。维系其内在同一性和连续性的因素，不是物质的因素，而是“包括政治理念、思想意识、宗教信仰、传统习俗等方面”在内的精神的因素。“古代天皇制是以儒家思想、佛教和神道为支柱的；而近代则是以国学（神道）、传统儒学和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为支柱的。明治维新以后，西方思想的作用不可小视，但其地位始终未超越传统的国学和儒学，其在天皇制的精神结构中占主导地位则是在战后。”

（二）日本文化家元的地位乃古代象征天皇一系世袭的唯一依靠

在中日学界，早在20世纪70、80年代，就已经有学者与王金林带着同样的问题意识开始研究日本天皇制。例如，王家骅在研究儒家思想与日本文化的关系时就曾指出，7世纪以后，日本封建统治者是在日本尚未形成自己的政治理论，而国内外形势又迫切需要进行社会改革的情况下，援用中国儒学为其提供政治理念，对儒学表示认同的。中国儒学的“天命”观和“王土王民”、“德治”、“仁政”思想等，在日本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中，对建立古代天皇制中央集权制度确曾发挥了有效的推动作用。再如，日本学者朝尾直弘，也曾在20世纪70年代就探讨过百姓的王孙意识对天皇世袭的影响等。<sup>⑩</sup>但是，在日本学界，真正从思想文化的视角，全面深入地探讨天皇为何能世袭千余年之原因的研究，也是近些年才日渐增多，其中，著名的日本中世文化史学家脇田晴子与本乡和人的著作较具代表性。<sup>⑪</sup>

中日学者间在谈到天皇为何能世袭千余年的原因时，经常会提到的一个理由是，因为天皇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所以天皇能够一系世袭至今。例如，在中国学界，有的学者通过将日本的天皇与中国的皇帝进行比较，来探讨日本天皇一系世袭的原因，称“如果我们将天皇制与中国皇帝制度作一番比较，就会发现日本的天皇制是政权与神权相对分离的体制，与中国皇帝拥有无限权力、有限权威的情况相反，日本天皇的神权即宗教权威是绝对的、无限的，而其政权即世俗政治权力却是相对的、有限的，天皇长期地超脱、超越于世俗政治权力，虽君临而不统治。换言之，日本历史上，天皇主要是作为神性权威的象征而存在，并以他的绝对权威来保障政治权力的正统性、合法性。天皇的这种特殊地位，使之历经沧桑，随遇而安。因此，总起来看，天皇制的大部分历史，是天皇与政权分离，远离世人追逐争斗的权力中心，这是天皇能够一系世袭至今的第一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sup>⑬</sup>这种日本天皇仅仅是“君临而不统治”就会具有权威，就能够保证世袭的观点，还是值得商榷的。

与之相对，日本学界对日本天皇为何会拥有如此高的权威，分析研究的要更全面也更深入一些。如有的学者主张，因为天皇得到了统一权力的保护，所以才拥有权威。天皇处于统一权力保护下维持其权威的时期，一个是在幕府统治时期，一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后至今这段时期。主张武家政权时代天皇的权威是幕府统一权力赋予的，<sup>⑭</sup>这种讲法虽不够严谨，但也不能说算错，只是它并未能解释清楚统一的武家强权为何不干脆就废掉无力的天皇，以便将权力与权威集于其自身。脇田晴子与本乡和人的研究成果，可以说，主要就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的。

脇田晴子认为，向某种神秘性或者是宗教性去探寻天皇权威的根源是错误的。虽然天皇可能需要借助宗教的力量来维护其统治，但天皇本身并非具有宗教性的存在，也谈不上具有什么神性权威，相反天皇才是需要宗教救济、护持的对象。天皇的权威，源于天皇乃是“贵族文化之家元”的地位。自古以来，以天皇为中心的贵族文化一直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到了室町幕府时期，各种

民众文化与贵族文化在天皇的主导下进行了大的整合。因此，作为“贵族文化之家元”的天皇的权威，通过官位制等广泛渗透到了普通民众之中，大大提高了民众对天皇的景仰，加深了民众对天皇的感情。<sup>⑮</sup>

本乡和人在其著述中，通过对史料的精细解读，简明扼要地再现了古代天皇的真实境况，指出天皇的权力被粗野的武家政权一点一点地剥离殆尽，有的天皇为了保住皇位甚至会像一个幕府家臣一般地对将军表忠心，谢“芳恩”，<sup>⑯</sup>尽管天皇软弱卑躬如此，但仍能使皇统连绵不断，使手握实权的粗野武士依旧不得不借重日本天皇的权威，其原因就在于天皇守住了其所拥有的“芯”——“信息和文化”，天皇坚守住了“信息和文化”之王的位子。<sup>⑰</sup>换言之，粗野的武士尽管可以极尽权能羞辱、恐吓、乃至换掉坐在天皇位子上的人，但要其废掉天皇这个“信息和文化”之王的位子还是有所顾忌的。

脇田晴子与本乡和人的观点，在解释古代象征天皇一系世袭的原因方面是具有说服力的，对思考近代天皇能够一系世袭的原因也极具启发意义。

## 二、近代君主立宪集权天皇一系世袭的原因

近代君主立宪集权天皇能够一系世袭的原因，概言之，就在于将权力与权威复归一身的天皇，通过制度设计，在经济基础及思想教化等方面全方位地进一步强化了“信息和文化”之王的位子。具体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 巩固经济基础是维系天皇一系世袭的根本  
为建立立宪天皇制，明治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最为重要的措施之一是，为保证天皇大权和权威，巩固皇室基础，在岩仓具视的建议下，政府竭力扩大皇室财产，以保证未来立宪天皇制的经济基础。根据《皇室财政沿革记》的记载，明治天皇从孝明天皇那里只继承了10万余元的财产。<sup>⑱</sup>1875年增加到51万余元，到1884年增为192万7,600余日元。1884年12月，日本政府决定把政府持有的日本银行的股份500万日元、横滨正金银行的股份100万日元，编入皇室财产。1887年，日本政府又把它在日本邮船公司的股份260万日元编入皇室财产。到1887年日本皇室财



产激增到 788 万 5,000 余日元。到 1889 年宪法公布时,已达到 1,000 万日元。<sup>19</sup>这样,天皇“又成了日本最大的地主和最大的财阀。”<sup>20</sup>

(二)《大日本帝国宪法》赋予天皇极权法律依据

1889 年 2 月 11 日,明治天皇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该宪法由天皇、臣民权利义务、帝国议会、国务大臣及枢密顾问、司法、会计、附则共 7 章 76 条构成,其核心内容就是规定了天皇的地位、性质及权利的“第一章 天皇”。

《大日本帝国宪法》“第一章 天皇”共由 17 条构成,其中第 1 条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的天皇予以统治”,<sup>21</sup>开明宗义,宣称日本由天皇统治。而且,该宪法还规定:“天皇统帅陆海军”(第 11 条);“天皇在帝国议会的协助下行使立法权”(第 5 条);“天皇召集帝国会议,命令其开会闭会停会及众议院的解散”(第 7 条);在紧急必要之时天皇可以“发布敕令代替法律”(第 8 条)。如上所述,《大日本帝国宪法》不仅将政治、军事大权集于天皇一身,而且其权利也超越于立法权之上,所谓的议会几乎形同虚设。另外第 3 条还规定:“天皇神圣不可侵犯”,这无疑又对天皇拥有的祭祀大权的宗教性权威赋予了法律依据。

如果说,通过《大日本帝国宪法》,树立了天皇的国家元首、家长和神统继承人的形象;那么通过《教育敕语》,天皇则成了亿万臣民的师表和维护皇国精神的守护神。<sup>22</sup>

(三)《教育敕语》强化了天皇的精神权威

1890 年 10 月 30 日,明治天皇批准颁布了由井上毅和元田永孚起草的《教育敕语》。《教育敕语》是一篇阐述了当时的日本国的教育理念、教育精神的文章,文字非常简洁,其全文如下:“朕惟我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济厥美。此乃我国体之精华,而教育之渊源亦实在于此。尔臣民应孝父母、友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恭俭持几、博爱及众,修学习业以启发智能,成就德器;进而扩大公益、开展世务,常重国宪、遵国法,一旦有缓急,则应义勇奉公,以辅佐天壤无穷之皇运。如是,不仅为朕之忠良臣民,亦足以显扬尔祖先

之遗风焉。斯道实为我皇祖皇宗之遗训,子孙臣民俱应遵守,将此通于古今而不谬,施于内外而不悖者也。朕庶几与尔臣民共同拳拳服膺,咸一其德”<sup>23</sup>。

通读这尚不足四百字的《教育敕语》,即可发现其理论构成实际上是以儒学的忠孝、国学的神统思想为基础,并融合了“扩大公益、开展世务、常重国宪、遵国法”等西方伦理思想的结合物。它不仅将儒学的“忠孝”之道说成是“教育之渊源”,还将其提升为日本“国体之精华”,明确地予以政治化、正统化,其根本目的就在于培养遵守“古今而不谬、施于内外而不悖”的“皇祖皇宗之遗训”的“忠良臣民”,使其在平时服从天皇制的统治,而“一旦有缓急”则可为之效忠卖命。

《教育敕语》颁布后,明治政府将其向公私立学校、幼儿园、教育艺术团体、感化院、养育院等颁发<sup>24</sup>,并发布训令,让学校每逢举行仪式之际,要召集学生举行集体诵读《教育敕语》的“奉读式”。《教育敕语》不仅规定了学校的德育方针,而且将其作为全体日本国民的道德准则,其所提示的神话式的“国体的理念”是以天皇之名而使国家官僚统治绝对化的言论。学校“修身”课的内容就是举具体的例子来详细讲解《教育敕语》,并要求学生们都达到背诵的程度。这样,政府通过天皇颁布《教育敕语》,并在学校内强制性向学生灌输,使日本人从幼年时起便开始接受忠君爱国思想的洗脑教育。日本近代天皇制政权,以“神国日本”的名义,打着“忠君爱国”的旗号,对内镇压思想言论自由和民主主义、社会主义运动,对外驱使盲从的日本民众侵略东亚各国,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毁灭性惨败,即是一个活生生的例证。这同时也证明了,《教育敕语》的颁布,的确对维护近代天皇一系世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此外,在天皇亲政时期,还再兴神祇官,强行神佛分离,确立国家神道,创立祭政合一体制,复活各种祭祀仪式,向民众渗透天皇思想,巩固了其祭政合于一身的“现人神”地位,强化了天皇一系世袭的权威。关于这方面的内容,村上良重在其著作中有过很详尽的论述,<sup>25</sup>在此就不赘言了。

### 三、战后君主立宪象征天皇一系世袭的原因

1945年8月15日，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负有战争责任的裕仁天皇曾被列入战犯名单，国际舆论亦强烈要求废除天皇制、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就连在日本国内，“从战争末期到投降时，在政府或重臣之间也普遍认为天皇应负战争责任”，<sup>②</sup>天皇制因此又开始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但是，结果天皇制还是被保存了下来，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也没有受到任何追究。1946年元旦，裕仁天皇在美国的授意下公布诏书否定自身的神格。1946年11月公布的《日本国宪法》规定天皇为“日本国民统合的象征”，这使得明治政府以来一直集行政、军事大权于一身并被视为“祭政合一”的“现人神”的天皇，被剥夺了所有实权，再一次失去了亲政近70年的权利宝座。天皇虽已成为一个不具实权的象征，但却能依然无恙存续，究其原因如下：

#### （一）日本统治集团的政治利益抉择使然

由于自明治政府以来对天皇制所采取的种种保护举措，在日本人的思想意识当中，天皇的宗教和精神权威已是根深蒂固，不可动摇，在日本的政治统治以及日本国民的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天皇对国民的政治心理、政治行为的影响是不可替代的。因此，战后以来，日本统治集团在加强天皇地位和权威的活动始终没有停止过。

在战后日本政界人物中，吉田茂可以说是维护和发挥天皇传统权威的急先锋，是一个最顽固的保皇主义者。例如，1952年11月，在以国家规格为皇太子明仁亲王举办册立太子礼时，他不惜违反宪法自称“臣茂”，结果招致了舆论的强烈谴责。但吉田茂却不屑一顾地辩解说：称“臣”有什么不好？我自己就是总理大臣。<sup>③</sup>他曾在回忆录中直言不讳地说：“我国自古以来君臣如一家，相辅相成，这就是日本的传统和历史”。<sup>④</sup>

战后制定的《日本国宪法》第1条规定：“天皇为日本国的象征，是日本国民统和的象征，其地位由拥有主权的日本国民的总意决定”；第9条规定：“日本国民诚实期盼以正义与秩序为基调的国际和平，永久放弃将国权发动的战争、武

力威吓或行使武力作为解决国际纷争的手段”。<sup>⑤</sup>吉田茂曾企图将该宪法的第一条和第九条予以修改，将象征天皇变为国家元首，再度为天皇复权；将“放弃战争”变为“自主防卫”，实现重新武装。在当时，吉田茂的妄想无异于痴人说梦，但时至今日，随着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的增强，安倍内阁将修宪视为其政治使命，大有志在必得之势。

#### （二）战后美占领当局的私心纵容之结果

二战日本战败时，美国出于自己的战略利益考虑，决定利用天皇对日本实施间接统治，没有接纳广大国际舆论的意见废除天皇制，而是予以了温存，这为天皇制的存续提供了决定性的转机。美国做出如此决策，完全是心理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建言献策的结果。对于美国的具体决策过程，在美国人道尔的著作《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中有较为详尽的介绍。

例如，有人在阐述为何要保留天皇时就说：“废黜或是绞死天皇，将会引发全体日本人极大的激烈反应。绞杀天皇对他们而言，就相当于对我们来说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所有人将像蚂蚁一样奋战到死。军国主义分子的地位将被无限巩固。战争将会过度拖延。我们将不得不付出更为惨重的伤亡代价。”<sup>⑥</sup>麦克阿瑟将军评价日本天皇的作用时亦指出：“天皇的力量胜过机械化部队20个师团”。<sup>⑦</sup>因此，美国为了避免废黜天皇而带来的负面影响，决定剥夺其政治实权，而保留其象征地位，以便利用天皇至高无上的精神权威的影响，更好地实施美国的占领政策。出于这种目的，美国政府指示麦克阿瑟将军说：“只要能促进满足美利坚合众国之目标，最高司令官将通过日本国政府的机构包括天皇在内的诸机关行使其权力”。<sup>⑧</sup>麦克阿瑟对“大日本帝国”的天皇制“国体”的保存，使曾经位于美国外部的天皇的攻击性，“已经被收编进美国在亚洲的新殖民主义的势力扩张的策略中了”。<sup>⑨</sup>

在此，对于战时为美国的决策建言献策的专家学者中，不能不提到美国女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如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德日败局已定，美国亟需制定战后对德、日的政策。对德国，美国比较了解，政策也比较明确，即武装占领，直接管制。对日本，美国不

太了解。当时有两大问题需要研究：第一，日本政府会不会投降？盟军是否要进攻日本本土而采用对付德国的办法？第二，假若日本投降，美国是否应当利用日本政府机构以至保存天皇？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美国政府动员各方面的专家、学者研究日本，本尼迪克特这本书就是受美国政府委托（1944年）研究的结果。她根据文化类型理论，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把战时在美国拘禁的日本人作为调查对象，同时大量参阅书刊和日本文学及电影，写成报告。1946年，本尼迪克特把这份报告整理成书出版，立刻在日本引起强烈反响。

在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中，对日本人如何崇拜其天皇有很多详尽的描述。例如，“在日本生活过的人都非常清楚，没有什么比用言辞侮辱天皇，或者攻击天皇，更会激怒日本人，并激起他们的斗志。”<sup>③</sup>“对他们来讲，天皇和日本是分不开的。‘日本没有天皇就不是日本’、‘日本的天皇是日本国民的象征，是国民宗教生活的中心，是超宗教的信仰对象。’即使日本战败，天皇也不能因战败而受谴责。‘老百姓是不会认为天皇应对战争负责的。’‘如果战败，也应由内阁和军部领导来负责，天皇是没有责任的。’‘纵然日本战败，所有的日本人仍会继续尊崇天皇。’”<sup>④</sup>“正如许多日本战俘所说，日本人‘只要天皇有令，纵然只有一杆竹枪，也会毫不犹豫地投入战斗。同样，只要是天皇下令，也会立即停止战斗。’‘如果天皇下诏，日本在第二天就会放下武器。’‘连最强硬好战的满洲关东军也会放下武器。’‘只有天皇的圣旨，才能使日本国民承认战败，并情愿为重建家园而生存下去。’”<sup>⑤</sup>

正是因为有了上述对日本人心目中的天皇权威的认识，本尼迪克特在报告中推断出的结论是：日本政府会投降；美国不能直接统治日本；要保存并利用日本的原有行政机构。因为日本跟德国不同，不能用对付德国的办法对付日本。战争结束，美国的决策同这位文化人类学家的意见一致，事实发展同她的预料和建议一样。

无论是日本政府精英们的做法，还是《拥抱战败》中记录的心理学家对天皇的认识，以及《菊与刀》中记录的内容，都关注到了天皇具有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但只有《菊与刀》尝试着解释

了为何天皇具有那样至高无上的权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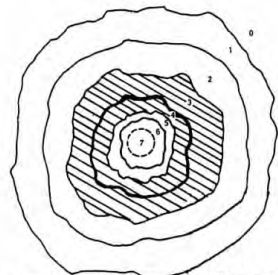
“按照日本人的定义，天皇，哪怕他在政治上无能，‘几乎是军事首脑的政治犯’，也是填补了等级制中的‘一个合适的位置’。在日本人看来，积极参与世俗事务，根本就不是天皇的分内之事。在征夷大将军统治的长达几个世纪的年代中，日本人始终如一地珍视天皇和他在京都的宫廷。只是从西方的观点看来，天皇的作用才是多余的。处处都习惯于严格的等级地位角色的日本人，却持有不同的看法。”<sup>⑥</sup>

应该说，本尼迪克特的描写、分析判断都是正确的，但是，如所周知，无论是等级制度，还是权威崇拜，皆非日本之专利，本尼迪克特并未能解释清楚为何日本人会那样倾心维护其等级制度，为何那样崇尚权威，并能将天皇奉为至高无上的权威。依据心理文化学的方法，或者可以对该问题做出一些补充回答。

（三）日本独特的社会心理均衡模式亦是天皇一系世袭千余年的重要原因

所谓“心理文化学”，即以心理与文化相结合的视角和方法，从事大规模文明社会比较研究的学问。<sup>⑦</sup>心理文化学理论的两个关键词是“社会心理均衡”和“基本人际状态”。“社会心理均衡”（Psychosocial Homeostasis，简称PSH）是许烺光在其学术巅峰时期提出的理解人的心理、行为与文化关系的理论模型。该理论把人的存在理解为一个由人与人、人与物、人与文化规范、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相互影响的“社会文化场”，这个“场”由内向外分为八个不同的层次，它包涵心理学的概念，以及许烺光在此基础上提出的社会心理方面的内容。<sup>⑧</sup>

0. 外部世界(outer world)
1. 较大的(远隔的)社会关系与文化  
wider society and culture
2. 有用的(运作的)社会关系与文化  
operative society and culture
3. 个人的(亲密的)社会关系与文化  
intimate society and culture >人(jen)
4. 可表意识(expressed conscious)
5. 不可表意识(unexpressed conscious)
6. 显意识(preconscious)
7. 无意识(unconscious) >弗洛伊德学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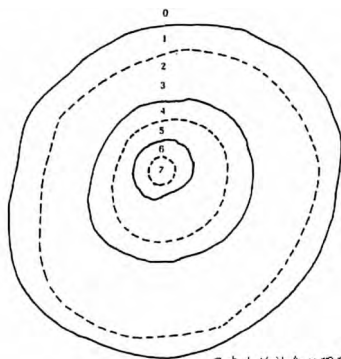
人的社会心理均衡 (Psycho-social Homeostasis, 简称PSH) 图

将上述 PSH 理论第 0 层到第 7 层的内容简要予以概述，即第 7 层潜意识与第 6 层前意识是弗洛伊德的概念。第 5 层不可表意识，是不与他人



进行交流的内容。第4层可表意识，是日常生活人进行社会交往沟通的主要内容。第3层亲密的社会关系与文化，是投入大量感情的人、事、物与文化规范等。第2层运作的社会关系与文化，是对于我们有用的人、事、物与社会习俗等。它与第3层的差别就是一个有大量感情投入，一个没有感情投入只是看是否有用。第1层远离的社会关系与文化，是既不投入感情也不使用的人、事、物等。第0层外部世界，指的是异文化，我们对它们不是不了解就是有误解。“基本人际状态”（human constant）是一个与“社会心理均衡”理论相联系的重要概念，一般是由PSH图示中第3、第4层以及第2层与第5层的一部分组成，可以理解为“人的系统”，它是一个比“个体人”更大的概念，是一种“社会文化场”，所谓的人的“社会心理均衡”过程就是在这个“场”内进行的。<sup>⑩</sup>

日本人的社会心理均衡模式，如下图所示，不仅第3层与第2层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而且第2层与第1层间也没有严格的区分（图式中以虚线表示）。这表明日本人的感情配置也较容易投注到这一层。第1层包括国家事务以及国家层面的人（如天皇）和文化规范（如类似民族主义之类的意识形态）。对这一层的感情投注意味着个体较容易将国家以及民族层面的意识形态等作为某种绝对或神圣之物而对其献身。<sup>⑪</sup>



日本人的社会心理和谐方式图

另外，心理文化学的一个基本假定是“如果由于亲属体系的本质加上塑造他的理想生活方向的文化取向，个人无法在基本亲属集团中满足他的社会心理和谐的话，他必须为了这个目的参加或形成其他集团。他在这么做的时候，所寻找集团的模式，以及他在该集团中的行动模式，都深受他的初始亲属集团加诸给他的内容种类的支配。”<sup>⑫</sup>

许烺光根据其优势亲属关系假说以及次级集团理论得出日本的亲属关系的特点是，与中国人共有同样的父子优位的亲属体系，是单嗣继承（一子继承）和母子亚优位。这一亲属体系使得日本社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次级集团——家元。典型的日本家元在结构上有四个重要特征：家元的地位具有神秘性；家元是一个以家元为顶点、联结众多师傅与弟子的、类似军队组织的等级分明的庞大体系；家元有最高的权威；家元虽不是真正的家族制度，但它的构造以及运作原理却模拟了家族制度的许多特点。“日本人无法依赖他的基本亲属集团来满足社会心理和谐的要求。反之，他得离开亲属集团而到我们称之为家元的虽更大但仍类似亲属的集团去取得。由于家元的境界并不受亲属限制，它比中国的族更具弹性，并有更大的空间做大幅扩展。在其最大的延伸中，天皇家好比包含全日本的巨型家元的本家。”<sup>⑬</sup>所以，“日本人的文化理想是对主人和天皇效忠，当有需要时，比人的和谐和其他一切都更重要。”<sup>⑭</sup>在现实的日本社会中，我们也经常能够看到日本人不惜牺牲人与人关系的和谐，而为类似“天皇、主君”的某一优位者、某一权威人物或某一组织体等的尽忠的社会现象，这也正是日本人带地位差的相互依赖模式的必然指向。日本部分历史学家、政客之所以那样热衷于臆造天皇“万世一系”的历史，并且这种历史观还能获得很多日本人的信奉，究其原因与日本人这种独特的社会心理均衡模式的影响有着密切关系。

总之，通过许烺光对日本人独特的社会心理均衡模式的解析，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为何日本人那样崇尚权威，以及为何日本人又总是将天皇视为至高无上的权威。当然，日本天皇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发展特征，天皇千余年的一系世袭，也会因时代不同而受到不同的因素左右，我们并不否认前文提到的影响天皇一系世袭的诸般原因，但我们认为日本人独特的社会心理均衡模式亦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以上，就中日学界对日本天皇何以能够千余年一系世袭至今的原因研究，进行了扼要地梳理和评析。日本人独特的社会心理均衡模式，就犹如一种文化基因，不会轻易改变，所以天皇及天

皇制短时期内仍将安然无恙。近几年，由于日本皇太子没有儿子的缘故，日本朝野关于未来皇室继承人的议论不绝于耳，有的甚至担心皇室就此衰败，甚至被废除等等。这些担心其实都是杞人忧天。日本皇统中女天皇并不是什么稀罕事情，在日本皇室一千多年历史产生的一百二十五代天皇中，就有十代八位女天皇。而且，其中八代六位女天皇集中出现在七、八两个世纪。<sup>⑤</sup>只要日本人独特的社会心理均衡模式安然无恙，天皇的性别并不会对天皇乃至天皇制的存续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凭日本人的国民性，凭日本人的智慧，只要“家元”这种社会隐性结构不变，不愁找不到去坐那个“天皇”之位的男人或女人。但是，随着日本少子老龄化、个人化及由此带来的日本人亲属体系的变迁，将会对日本人的基本人际状态带来怎样的影响，倒是值得关注。因为若日本人的基本人际状态发生了变化，则天皇的世袭也将有可能难以为继。

注释：

王金林：《日本天皇制及其精神结构》，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6、8-9、10页。

解晓东：《日本天皇制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09年。

参见（美）道尔：《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胡博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54页。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如较具代表性的论著有井上清：《天皇制》，东京大学出版会，1958年。

解晓东：《近年来我国日本天皇制研究述评》，《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第55-59页；沈才彬：《论日本天皇的本质特征》，《日本学刊》1989年第5期，第37-42页。

王家骅：《儒家思想与日本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1页。

①朝尾直弘：《幕藩国家与天皇》，东京大学出版会，1975年。

②脇田晴子：《天皇与中世文化》，吉川弘文馆，2003年；本乡和人：《天皇为何得以保留？》，新潮社，2009年。

③沈才彬：《论日本天皇的本质特征》，《日本学刊》1989年第5期，第41-42页。

④参见水林彪：《幕藩体制下的公仪与朝廷 统一权力形成期的天皇制复活理论》，《日本社会史第3卷 权威与支配》，岩波书店，1987年。

⑤脇田晴子：《天皇与中世文化》，第2、3页。

⑥⑦本乡和人：《天皇为何得以保留？》，第155页、第204、205页。

⑧冈田章雄等：《日本历史·明治的历史（第11卷）》，读卖新闻社，1965年，第63页。转引自解晓东：《日本天皇制研究》，第54页。

⑨黑田久太：《天皇家的财产》，三一书房，1966年版，第97页。转引自解晓东：《日本天皇制研究》，第54页。

⑩伊文成、马家骏：《明治维新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613页。

⑪有关《大日本帝国宪法》的条文，皆引自小森义峰：《天皇与日本宪法》「付録」，皇学馆大学出版部，1991年。

⑫王金林：《近代天皇制的理论结构》，《日本学刊》1995年第6期，第118页。

⑬小森义峰：《天皇与日本宪法》，第306页。

⑭详见《文部省例规总览》，东京玄文社，1942年，第11、12页。

⑮村上良重：《天皇与日本文化》，讲谈社，1986年，（第七章 王政复古与皇室祭祀）。

⑯井上清：《天皇的战争责任》，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98页。

⑰⑱井上清：《天皇制》，第1、2页。

⑲郑毅：《铁碗首相吉田茂》，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31页。

⑳小森义峰：《天皇与日本宪法》，第422、423页。

㉑（美）道尔：《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第258页。

㉒⑳㉓㉔㉕（美）本尼迪克特：《菊与刀》，长谷川松治译，社会思想社，1967年，第346、39-40、40-41、42、82页。

㉖小森阳一：《天皇制与现代日本社会》，《读书》2003年第12期，第12页。

㉗欲详细了解该研究方法者，可参阅尚会鹏：《心理文化学要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㉘该图表参照（美）许烺光：《家元：日本的真髓》（于嘉云译，台北：南天书局，2000年）第124页内容及尚会鹏、游国龙的译语制作而成。

㉙尚会鹏、游国龙：《心理文化学——许烺光学说的研究与应用》，台北：南天书局，2010年，第200页。

㉚⑳㉛㉜（美）许烺光：《家元：日本的真髓》，第138、206-207、207-209、207页。

（责任编辑 王铁军）